

文 化 和 传 播 译 丛

信 息 方 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

周 宪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方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美) 波斯特
著; 范静哗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文化和传播译丛)
ISBN 7-100-03012-9

I. 信… II. ①波… ②范… III. 结构主义语
言学-关系-视听传播-媒介语(语言接触)-研究
IV. R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264 号

文化和传播译丛

信 息 方 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

周 宪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012-9/G·394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4.00 元

文化和传播译丛

总 序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一空分离或时一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一他者、本土一异邦、民族性一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

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致 谢	5
导 论 无物之词	7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32
贝尔与修辞问题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61
经济学的语言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96
参与式监督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134
电脑的主体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174
后现代政治的诸种可能	
注 释	210
人名索引	238
译后记	240

中文版前言

马克·波斯特

适

值《信息方式》译成中文之际,我想借此机会简短回顾一下我自本书 1990 年以英文面世以来的工作。《信息方式》探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电子媒介交流的关系,指明前者如何使后者可被理解,而后者又是如何破坏并改变前者的轨迹。因此,《信息方式》首开一种思考方式,但并未将其触觉伸及它的所有意蕴。

其后,我于 1995 年出版的《第二个媒体时代》一书则力图纠正这本书的某些不足。我特别对后结构主义和电子传播的结合提出来的一些政治问题,开始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我探讨了后现代理论及新技术与多元文化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关系等论题。我还述及哈贝马斯的共识交流理论与波德里亚的模拟符号学。最后,我对早期关于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数据库的关系的讨论,尤其是关于主体的构成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拓展与澄清。《第二个媒体时代》的另一首创是联系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发展将刷新我的理论分析。《信息方式》考察了法国迷你电信(Minitel)这种联网电脑的早期试验,从而引入了作为交流技术的联网电脑这一问题。但是,全球化的电脑网的蓬勃兴起是 90 年代初的事,这时的网络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因此,我在《第二个媒体时代》中便能够界定诸如收音机、电影、电

视这类播放媒体与因特网这样的互动媒体的特别重要的区别。我把信息方式的概念进一步引入到对因特网的分析中，从而使我能够辨别在新技术下身份的形成有着这些独特特征：即人们坚持将自我构建看成是技术文化的直接特征。在因特网社群中，人们为了联机交流而塑造一个身份。联机交谈的成功与否随人们以文字改变自己所塑造的身份的能力而定。我把这种实践理论化，认为这是因特网所特有的，尽管早期的一些习俗，如化装舞会、私人广告以及笔友，也预含其某些特征。关键之处并不是在意识中进行理想主义的自我构建，而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身体与言语行为或书写的分离使得自我构成的新形式成为可能。这些实践新就新在它们对停泊于社群中的中心主体这一历史幻觉进行系统化的抵制。

自1995年以来，我的工作就一直集中于对因特网进行理论考察。在《赛博民主：因特网作为一个公共领域？》(Cyberdemocracy: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一文中，我批判了人们常见的那种将赛博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中的努力。我论证，在赛博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因特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且暗示了力的种种新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发展起来。《虚拟现实的理论化：波德里亚与德里达》以及《虚拟种族》两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是联网电脑所特有的那种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可能会如何影响种族性。人们置身于赛博空间时，能否继续保持其植根于地域的种族身份？有了因特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民族、身份与全球技术》一文则比较了印刷在民族身份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与因特

网上的书写条件。《数字作者与印刷作者》一文考察了福柯的作者功能这一观念，进而对比了书籍时代的原作者身份（authorship）与全球化的多媒体超文本的原作者身份。我们所知的原作者身份这一概念具有合法的思想特性的框架，因此我提出这一问题，在出版向游移不定的电子化转换时，这种原作者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技术的存在》一文对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论著加以批判，赞许他拒绝把工具性当作对机器的解释，但也质疑他的理论对信息机器的适用性。作为对自然和人的“挑战”及“储存”的技术被海德格尔界定为工业时代的原则，人们是否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技术也进行如此理解？

我目前承担着两个项目。其一是有关数字生产与复制时代的商品。我的问题是，当物体已变成非物质或数字化的时候，对商品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构型是否还有可能？其二则是向因特网日益发展的世界提出一个很一般的问题。因特网到底是何物？我的论点是，它与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的任何以往形式都不相似。广延物体使得“思维客体”能够将其自身构建为一个外部他者，处于一个能够认知并掌握广延物体的位置。因特网便是一个广延物体，就像一把锤子：无论其构型是多么复杂，它仍由物质客体构成——电脑、电话线、通讯卫星和电缆线。然而，它并没有早期广延物体的固定性和种种局限，而是更像心智或精神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物体迷惑了主体与它的他者之间的正常联系，为人类结构的形成打开了种种新方向。我们是否将要进入一个决定性不足（underdetermination）的世界，自我在这一世界中将被结构成后人类（posthuman）？我计划在以后的几年里，探讨新媒体所提出的这些较为棘手的问题。

献给 Jamie

致 谢



书观点的酝酿发展历经数年。在此期间,许多同事及朋友以评论、建议、批评、鼓励及警示等形式参与了这一过程。我对下列诸位的帮助以及他们阅读我手稿的不同章节表示感谢: David

Carroll, Andrew Feenberg, Rob Kling, Tania Modleski, Leslie Rabbine, John Rowe, Gabriele Schwab, Martin Schwab, Miriam Silverberg, Jonathan Wiener. Robert Sieber 帮助我完成第五章中所讨论的关于电脑科学学科的研究。我在不同研究所提交过本书中的材料,在此过程中获得许多人的有益反馈。对他们的兴趣及关心,我深表谢意。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深深得益于我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批判理论研究所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而且有诸位同仁对我的工作的反馈意见。加州大学的校长人文研究基金会容许我有时间写完此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系学生以及学校对批判理论的重视,以及他们对我观点的怀疑、热忱或批判使我获益匪浅。导论中的部分内容以“无物之词:信息方式”为题刊载于《十月》学刊第五十四期(1990年冬季号)。第三章的部分内容以“福柯与数据库”为题刊载于《话语》第十二卷,第二期(1990年春夏号)。第四章的部分内容的初稿将以“电脑

的主体：德里达与电子书写”为题收入 Jose Lambert 编的《文学与技术》（*Literature and Techn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一书（即出）。

无物之词

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若其交通手段发达,其人口就比一个人口数量大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国家稠密;从这层意义上讲,例如,美利坚联盟北部诸州的人口就比印度的稠密。

马克思《资本论》

以

电子设备作为媒介的传播环节与日俱增。人们看电视、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影、使用电脑、传真、录像机及音响。这样的手段存在于每个机构及每个社会群体。政治、工作、消费、家庭、军队、教会、教育、休闲活动——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同程度地采用电子装置进行交流。每种情形下,符号的交换、信息的发送与接收、资讯的获取都仍像人类使用语言之初,一如既往。然而,变化总还是有的。电子交流手段因为其电子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新的语言经验。但是,它们与普通的言说及写作有何差异?此差异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本书便探讨这些差异,并特别考察种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它们可能会有助于从这些差异的角度为社会批判理论开辟一些新的阐释策略。

有些评论者论证,电子设备的引入并没有对某种交流的性质或结果造成实质性差异。在电视竞选广告上游说的政客,仍然得按宪法的民主准则尽力获取选票。工人用电脑控制流水线工序或打印一封信,还是以聘用合同按劳取酬,这跟过去是一样的。消费者通过看电视获得的商品信息,其商品仍然只是能在商店里买到的,这与读报了解信息极为相似。军人用电脑控制导弹以击中目标,正如箭手以目力瞄准一样,操练的仍是毁灭敌人的艺术。电子设备只不过增强了所讨论的这种交流的效率而已。从这一角度看,语言似乎只是有所行动的人类主体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与特定体制结构中个体具体职位的意图相比,其重要性显然处于次要地位。

电子设备也没有使得解释传播的性质的诸种理论失去效用。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的交流手段仍然被囊括在阶级斗争的论题之中:一个人能否获取更多信息,因其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电子媒介强化着文化工业,使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更加强劲。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法则决定了谁将使用电脑,谁将在电视上做广告,谁将给收听无线电的人播放他们的歌曲。对一个韦伯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使社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亚系统,并助长了科层权力。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不会游离于名目繁多的宗派间的权力角逐之外。甚至对技术决定论者而言,这也毫无新意:电子媒介进一步证实机器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机器减轻了人类的艰辛,使自然顺乎人类愿望。无论一个人的理论视角是什么,其结论似乎都不容争辩:事物并没有随着电子媒介交流的引入而发生根本改变。

这些视角都看出并谈到了电子交流带来的某种改变：人与人之间符号的交换如今已不再受到时空的制约。如今，从理论上讲，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瞬息即得，并且只要有电能就可以存取信息。时间和空间已不再限制信息交换。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随之而来的诸多重要结果，将会对现有种种理论及立场的适当性提出质疑。60年代末，越战场面被电子化再现，传送到美国家庭，对政治造成的影响令人振聋发聩。1985年菲律宾叛军占领了一家政府电视台后进行的播送，使公众对他们的成功更加确信无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马科斯政权³的命运。最近出现的电视直销则预示着消费品营销惯例的一场革命。对指纹进行电脑分析，而给逮捕疑犯提供线索，这使得执法部门的情报获取手段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电子媒介为人们展现的全球信息瞬间即可获得的这一前景，显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仍然有待确定。电子媒介对时空的征服所预示的是，理论及种种机制仅仅再转一转惯例和观念的调谐钮是远远不够的，它们这样是收听不到新的传播频率的。

例如，电子媒介使得互联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便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以研究机构的电脑网络为例。早在1988年11月，报纸便报道了一家由国内的军队、公司和大学约6000台电脑联网的ARPA网（译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计算机网络）被“一种病毒感染”，结果是功能瘫痪。^①“病毒”是附着于其它程序或文件上的一个很小的“程序”，或者说是一组指令，它在进行自身常规操作的同时又可以复制自己。病毒既能在一台电脑内传播，又能随着电脑文件或信息的传输从一台电脑传输到另一台电脑。病毒还能执行种种指令，这些指令可以是“在屏幕

上显示‘搞到你啦！’”这样没什么危害的指令，也可以是“删除硬盘上的所有文件”这样灾难性的指令。1988年11月份出现的那种病毒只是锁死了电脑的存储器，无限制地复制自己。对用户来说，关闭ARPA网代价很大，而又无可奈何。尽管没有文件受损，没有资料丢失，也没听说有什么犯罪行为，但中央情报局还是被召来追查肇事者。

病毒是指在活的有机体间传播疾病的介质。把这一术语转用到电脑上，也就强调了电脑网络与活的有机体间的相似性：电脑相互联结得如此之深，这就使得它们的行为好像一具身体中的许多器官一样。正常情况下，机器若是机械性互联则不会把物理力传输到其它机器上，因而这一互联链中的其它点上仍然可以不受故障的影响。电脑则像活的机体一样，呈信息性互联，这样就能相互传递复杂的指令，从而可能使整个电脑网络失灵。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日益与电脑网络相联，并依赖它们发

4 挥其作用，社会便像产卵一样产下了大量的电子的、信息的“机体”，它们像人类社群一样易受“传染病”之患。如今正当艾滋病毒威胁人类社群之时，其它病毒则威胁着电脑社会。若说艾滋病由性接触传播，电脑病毒的肇始，在ARPA网一例中，则出自俄狄浦斯式的性心理语境。该病毒的原创者乃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其父亲是一位电脑安全顾问。如此看来，资讯学分析(Cybernoanalysis)与心理分析两个领域似乎可以相互联系了。但是电脑病毒实在常见，且出现的日益频繁。1989年1月和2月所报告的病毒总数达三千例。②病毒不再是一出弗洛伊德所言的俄狄浦斯情结戏(Oedipal drama)，也许应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对抗形式，所抗衡的是控制着电脑化信息的那些人。

在另一个颇为不同的层面上传布着这样的报告，说电脑显示器，实为整个电子网络，能改变 DNA，从而在深层影响使用者的身体。^③如果说病毒这个隐喻暗示，电脑网络已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机体，那么与电脑显示器打交道便受到潜在的辐射影响。这种说法，则暗示电脑与其使用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人类与机器间的共生合成体(symbiotic merger)可说是正在形成。我们一直觉得人类身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界限，而这种共生合成体威胁了我们这种感觉的稳定性。人类创造了电脑，接着电脑又创造新类型的人，这也许正在悄然发生。无数电影(如《机器警察》)和科幻故事(尤其是菲利普·K. 迪克的小说)对此已有预示。虽说这些推测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些极富成果的方向，但我们可不能撇开眼前更为直接的问题。

电脑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更加显明了信息方式时代中社会新的脆弱性。从病毒开始传播到整个网络的关闭，几乎不用什么时间。同样，1987年10月证券市场瘫痪的消息瞬间便从纽约传到伦敦和东京，而对方的反应传回纽约的速度也同样之快。两个地方相距甚远，本可给人提供一点时间宽限，以便使人作出谨慎的反应，而如今距离已不再起缓冲作用。金融恐慌自一个金融中心传到另一个金融中心，犹如动物对危险的感觉一样很快便传遍整个群体。《纽约时报》报道过一件事，注意到了电脑对股票价格下滑的影响。^④通讯网络把世界金融中心连接起来，使它们能更好地获取信息，但同时也使它们可能在顷刻间经济瘫痪。于是乎，语言的高效率传输这一简单实用的优点，只是因为速度的提高而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确如量变“辩证地”转化成了质变。而这一社会现象促使人们对文化的语言学层面